



张博与周恩来总理的建筑情缘

张海鹰



张博(右二)向周恩来汇报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

周总理在南开同学会上的演讲,令张博对中国共产党有了翻天覆地的认识

1911年4月12日,张博出生于广州两广总督署衙门,同年底随其父两广总督张鸣岐流亡日本,1913年定居天津,十年后入天津南开读书。“1923年我正式考入天津有名的南开初中一年级,校长是张伯苓先生,已是当时的名教育家。周恩来总理幼时也在南开读过书,比我高十级左右。”(摘自《回到故乡——建筑师张博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到故乡》)

周恩来总理是1913年8月考入天津南开学校的,1917年6月毕业。据此得知,张博和总理虽为校友,总理从南开毕业六年张博始入校,二人失之交臂。张博第一次见到总理是在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

1936年夏,张伯苓在重庆沙坪坝买800余亩地,建立了私立南渝中学。1938年底,张伯苓在重庆朝天会馆组织了500多人参加的“南开同学会”,邀请南开校友、时任中共中央代表、国民党政府军事

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作形势报告。当天,作为南开校友的时任重庆基泰总所图房主任建筑师张博亦被邀请参加,并有幸聆听了周恩来的演讲。周恩来从政治、军事、经济和政我双方的斗争形势及策略上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精确的分析,科学的论断,有力地激发了校友们的爱国抗日热情。

周恩来精彩的演讲,令不问政治、只想求艺谋生的张博茅塞顿开,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有了崭新的认识,并唤起了他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50余年后,张博感慨道:“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旗帜下,周恩来同志驻重庆,应邀为南开同学会作形势报告。我作为校友,参加了报告会。会前久闻大名,但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共、共、共、共’的恶毒宣传,似乎共产党都是青面獠牙的残暴之徒,使人望而生畏的人物。现悉周先生生于1898年,当时尚不到41岁,身穿制服,风度翩翩,神采奕奕。来到会场,对到会的约五百同学介绍敌、友、我的前线交锋和后方准备情况。报告先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和斗争形势上做叙述、对比,侃侃而谈,深入浅出,令人鼓舞。

舞。这是我到重庆以来,对抗战形势第一次的了解,鼓舞了人们的斗志,打消了不少唯武器论的偏激观点。”(《回到故乡》)

北京饭店东楼出“风波”,总理指导张博“亡羊补牢”

1951年3月,张博毅然辞去香港基泰的高薪要职,由香港回到北京,“只想为国家建设多作点贡献。”(《回到故乡》)1958年9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央提出在北京建设一批包括万人大礼堂在内的重大建筑工程,并要求这些工程在1959年国庆节时投入使用。经过层层筛选,由时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设计师的张博作为总建筑设计师,承担“国庆十大工程”之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的设计任务。

1972年底,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和关照下,“文革”中被打成了“特务”、惨遭迫害的张博再度受到重用,担任北京饭店扩建工程的总设计、总指挥。“我虽在病中,也不甘落后,在病榻上积极构思、勾画草图……我为了不辜负总理的期望,仍在努力工作。”(《回到故乡》)

张博设计的北京饭店东楼模型做好后,一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提出建议,“北店扩建新楼超过百米也不算高。”“看来他并没有了解周总理原批示的55米之高度。听到这个指示之后,设计小组不少青年建筑师十分高兴,马上否定了原批准的方案,另起炉灶,设计新的超百米的塔楼。……如何处理总理和副总理之间的不同观点,实在是束手无策,进退两难。……在催交新方案模型之际,走了顺水推舟的道路。万万想不到,这个修改方案会周总理带来不安和麻烦。”(《回到故乡》)

当北京饭店东楼建设到第13层时,张博被告知:“总理在夜间从南海里看到了施工的灯火,感到新东楼已经到了对南海有威胁性的高度,十分忧虑。”不久,张博又被告知:“总理指示,建筑必须终止在15标准层。”

1973年10月30日凌晨1点,总理召

见张博时即说:“你好,我们有14年没见面了。”随后,落座谈心。“我万没想到总理并没有开门见山谈主题,而是首先问我先父的一生情况,并说他儿时听说过两广总督的传闻……然后了解我的每一个家庭成员情况,还关心我在‘文革’中被抄家的经过和感受。我说,经过通读主席四卷,有些自知之明,还能三个正确对待。总理赞赏地说,就是要改造思想,一定要活到老,干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说家常就用了差不多一个钟头,令我十分感动。”(《回到故乡》)

转入正题后,总理对张博说:“我已6天没睡觉了,内心很不安,在中南海就能观测到冒出来的北京饭店新楼。还是原来那个50米左右的方案好。”“我先作检讨,未能严格遵照总理批准的55米高的方案执行决议,提高后又没有作请示报告,是有责任……总理及时发现,及时处理,还算亡羊补牢之举。”(《回到故乡》)

此后,张博和周总理就如如何弥补东楼的“缺口”进行了多次交流和整改,最终妥善解决了楼高危及中南海安全的问题。总理说:“造成的浪费由我负责。”“总理这种身教、言教,以身示范的做法和严谨的作风,使我永生难忘。更说明总理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高度负责精神。”(《回到故乡》)

张博扶病设计北京新图书馆,以慰总理遗愿

1975年3月,周恩来提议并批准兴建北京新图书馆。在周总理的关心下,当选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张博参加了新图书馆的设计工作。“听到北图是总理的关心项目,迎难而上。”(《回到故乡》)

北京图书馆的前身是清京师图书馆,随着馆藏的不断增长,馆舍几次扩展仍不够用。在总理关怀下,选定了北京图书馆新馆址,总理指示:“建馆要有长远观点,要向一劳永逸方向考虑,书库的近、中期的发展更要作全面考虑,同意集思广益,搞好设计。”新馆的设计云集了

当年各大建筑院校、建筑设计单位和著名设计师,共征集了114个方案,经过反复比较,选用了建设部设计院和中国建筑西北设计院的方案,最后经过杨廷宝、戴念慈、张博、吴良镛、黄远强等五位设计大师给予综合调整。

1976年1月9日清晨,当张博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收听到周总理病逝的消息后,悲痛欲绝。“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理已经深入人心。全国各族人民有共同怀念、悼念的感情和悲痛是发自内心的。我更不例外。回忆1972年时,总理表达希望活到80岁,为党多做一些工作的愿望,再联系总理说北图一年不能建成就来不及了等话语,说明总理早知重病在身,但仍抱病处理国事,不但会见外宾,并以身作则,亲临指导做西华门屏风楼,尤其是想起在庆祝人民大会堂胜利建成,在庆功宴上高兴地说:‘打你五分!他的音容笑貌,仍在眼前耳边。更远一点是在1938年,总理留驻重庆,以南开中学同学会名义,为校友报告抗日战争的前后场景区,距今仅38年。思前想后,不胜唏嘘。”(《回到故乡》)

为了报总理的知遇之恩,也为了完成总理遗愿,张博化悲痛为力量,夜以继日地设计北京图书馆新馆建设方案,累倒在办公桌前,“当再复读总理对‘北图’的眉批‘一劳永逸’字句时,感到总理是在利用成语鼓励并号召我们要竭尽全力做好设计工作。为了悼念总理,自认为最好以实际行动来做表示,更好地在五老小组中起到日夜夜画,以缩短工作进程的作因。就在即将统一各方面意见之际,我因过度疲劳而晕倒在建设部设计院的图房之中。急诊后方知已戴上冠心病的帽子,血压偏高。参加四届人大时,会医检查说我仅有心肌劳损,不料发展得如此之快。但我并未休息,再接再厉,终于在1976年4月初完成任务,并在我院做出正式的北京图书馆新馆模型。”(《回到故乡》)

1999年7月1日,张博在北京病故,遵其“落叶归根”的遗愿,其骨灰被安葬在他的故乡——无棣县车王镇段家村张氏族茆亲墓室旁。

游氏纪实故事之一:

元末明初,农民起义军将领游政因患落籍滨邑建“泗户游”,即今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沙河街道中游村,明朝时期分出前游、中游、后游三个村,历经600多年,现有20多村庄,3000多位后人。

笔者历时2个多月的采访、搜集、整理出8篇纪实小文,怀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敬,尊重历史、还原历史,为挖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一份绵薄之力。



滨州游百川纪念馆。

游氏先祖为春秋时期郑国贵族,至今已历96世

游氏是一个多源流的古老姓氏,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宗族,源出于姬姓。春秋时期,周厉王姬胡的儿子姬友,被其兄周宣王姬静封于郑,建立郑国。春秋时期,郑国国君郑穆公有个儿子叫偃,字子游,他的孙子游皈以祖父之字命姓,其后皆以“游”命姓,称游氏。

《交际大全》“郡望篇”亦载道:“游氏广平、冯翊,声实俱茂(雅),秀美而文(古),

清德重名(醇),善诗卓识(诚之),独步六朝之伯始(肇),并肩三辟于高间(明根)。”可见游姓源远流长,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曾抒写了壮丽的诗篇。

不管时空转变,王朝更迭,游氏宗族都把河北广平作为祖源地,修谱、建宗祠都以“广平”为号,游氏自子游至今已历96世,2600多年。跨地万里,但游氏谱系不乱,昭穆分明,血脉相连。

为缅怀祖先,弘扬祖德,团结宗亲,命脉传承,共续文化,2009年1月1日,游氏后裔游灿华成立“游氏网”,成为国内第一个姓氏综合门户,为游氏本姓族人

提供族谱、宗祠、辈份、人文、寻亲问祖等相关信息和服务,也成为海内外了解游姓发展成就的窗口。

滨州游氏始祖游政立村“泗户游”,至今已有25代

沙河街道中游家曾名:泗户游,游氏碑记:“始祖游政,元季以战功封侯”。游氏谱云:“自元,至正间(1341—1368)占籍滨邑,立村为泗户游”。明代,游氏三支分居,一留原村(即中游),一在前立前游家,一在后立后游家,遂改原“泗户游”为中游家。

滨州游氏始祖游政,江西青溪人,元末朝政腐败严重,天灾不断,农民进行推翻元朝的武装斗争。游政从江西拜别父母,后辗转投靠朱元璋,又跟从徐达,常遇春北上伐元,在攻占滨州邑的大战中负伤,不能继续随军打仗,遂留守滨州。北伐结束后,他因战功显赫封侯,占籍滨邑,游氏遂在此繁衍生息。

戾倭多年征战,渴望过上安定祥和的生活,游政辞官为民,欲寻安居乐业之地休养生息。

对此,朝廷许诺他在滨州邑自寻安家之地,充分体现了对开国将领的礼遇。游政信马由缰转了好几天,一天来到了滨州城西南三十多里的地方,这里水草肥美,生机勃勃。忽然在前方不远处有一条大花蛇和一只蓝花野猫正在激战。

游政捻须一笑:刚才看到的不是—

场龙虎斗吗?龙虎相争的地盘,定是极好的风水宝地。游政确定这里就是他寻找的理想家园,百年之后他就要安息在这龙虎相斗之地,保佑后代子孙成为国家栋梁,荣耀游氏家族。

600多年来,以中游村为中心向外发展出了前游村和后游村,以及杨柳雪的游家庄子村,还有惠民县的杨子学村、老北镇五四、姜家游姓等。游政后代至今已25代,并分散在辽宁、北京、天津等地,将近20个村庄约3000人。

中游家村游百川是游氏后人杰出代表

游氏自始祖子游始,由于尚儒重文,礼仪传家,各代名人辈出,彪炳史册。1862年(清)同治元年,中游家村游百川(1822—1895),字汇东,号梅溪,中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院,授编修。历任福建道监察御史、刑科给事中、御史、顺天府尹、总督仓场侍郎等职。

在任期间,他不畏强权,敢于惩治不守法纪的宗室亲贵;数次上疏力阻穆宗重修圆明园,震动朝野;在湖南禁烟禁毒,广受好评;在山东治黄尽心竭力,很快稳定河患,并提出《治河三策》,是为治黄史上重要著作。

游百川幼年丧父,家境贫寒,母亲帮佣资助儿子求学。他自幼聪慧好学,自知发奋,自强自立,感化名师免费教授。

此后,顺利考中秀才、举人、进士,官至户部侍郎,正二品。“山高水长有时尽,唯我师恩日月长”,他做到了尊师重教,回乡时曾“八里下轿”,看望老师杜源。罢黜归乡后,他先后被聘请主持济南泮源书院、东昌府书院,学生甚众,广受敬仰,世人评价“激浊扬清,乱世贤才”。

近年来,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围绕游百川打造历史文化名人品牌,讲开发故事,彰显历史文化底蕴。目前已在黄河三角洲文化产业园区建成游百川纪念馆,出版《游百川传奇》《游百川研究》丛书,游百川故居复原工作也在有序开展。

2013年清明节,游政后人齐聚中游村,重修游政墓并立碑。游百川后代至今已五代,中游村为二子游礼贤后人,在北京为四子游炳贤后人,也于2013年重修游百川墓并树碑立传。如今连续五年清明时节,全国各地游政后人都回到中游村祭祖寻宗,自发举行隆重的祭祖活动,并修缮族谱,把游氏的家风家训发扬光大。

随着城镇化逐步推进,位于黄河五路、渤海三十路的中游村,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被选为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新址所在地。2018年中游村将被整体搬迁,600多年的村史即将改写。

为游氏家族、家风的传承与发扬,60多岁的中游村党支部书记游森恩多方奔波呼吁建设游百川故居,保留中游村的古风原貌,让游氏宗族血脉的渊源延续是游氏后人殷切的期盼。

搜书志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以貌取人也是正常心理,自古相沿。谁家女儿也都想着挑个宋玉、潘安,没人愿意招个女婿长得跟加西莫多似的。但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能把一个人的模样问题提到“政治的高度”上来认识。以至于早在三皇五帝时就把相貌作为考察干部的一个重要条件——《大戴礼记》记载,尧帝依据人的容貌说官授职。



戏曲中的曹操形象。

到了后来,此风日盛,汉末魏晋时期达到一个高潮。东汉汝南郡吏许劭闲居没事就喜欢看人玩儿,然后做些没头没脑的点评,多半和政治挂钩。比如他给还未发达时的曹操相面,说你小子是“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按说这话怎么听也不像

句好评,可曹操居然哈哈笑着认了。这张大白脸可真够好的。

他还有个怪癖,爱在每月初一(月旦)和他堂兄许靖一起评论乡里人物,每月一换话题,“故始朝各有月旦评焉”(《后汉书·许劭传》)。

玉手纤纤的西晋大美男、大书法家、大

都是模样儿惹的祸

钱杰

臣王衍有一回看到十四岁的奴隶娃子石勒在城门口吹口哨,大惊失色,对随从说,听这孩子的声音,看他的相貌,将来一定是国家祸患。潘滔则人为王敦“眼睛像蜜蜂,声音似豺狼,若不害人必定害己。”(《世说新语》)

如果说这些对人物模样的评论还仅限于一些心血来潮的片言只语,到了宋代,大文学家苏洵则撰出千古名篇《辨奸论》,尖锐地、系统地、指桑骂槐地数落了一通政敌王安石的“脏样儿”。

文中说:“脏脏了要擦,衣服脏了要洗,这是人之常情。但现在有的人不是这样。他蓬首垢面,神态猥琐,如此模样却同人家高谈阔论诗书,这难道合乎人情吗?凡是做事不合人情的人,很少有不是大奸大恶的。古时的奸臣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种人。”请注意神补刀在最后这一句上:不注意形象——不通人情——奸臣,如此逻辑,众所周知地把王安石套了进去。王安石文章学问“三苏”齐名,政治上的成就更大。但在当时,认为他是奸臣的却不在少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修边幅,邋里邋遢”。

宋人陈正敏在《颺斋闲览》中有一段

镜头感丰富的记述:一次在朝堂上,忽然有一只虱子从王安石胡须里探头探脑爬了出来。他是参知政事,是相当于副宰相的大官,站得离神宗皇帝很近。皇帝看他那个德行,不禁莞尔。散朝后,他向身边的一位大臣,皇帝笑什么?人家指指他胡子上那只虱子,他才恍然大悟,急忙要捉来捻死。那大臣摇摇头制止他说:“这只虱子可简单。有诗为证:‘鬣游相须,曾经御览,未可杀之,或曰放之!’”引得哄堂大笑,王安石大窘。其人缘平常亦由此可见一斑。神宗拿他当一乐,不过一笑置之,可后来的哲宗皇帝是格外地讨厌他,以至终于罢相,变法随之失败。都是模样儿惹的祸。

明清之际,以貌取人被正式引入用人机制。徐九经湖广解州,金榜高中,就因为两耳不平,模样清奇古怪,被做了个小小的县令,虽是公文,却因清瘦明代吏治的荒唐腐败。

台湾作家兼史家、“野翰林”高阳(许晏骝)先生著《清朝的皇帝》是一部严肃的史学著作,其中记载阎敬铭(曾任山东巡抚、户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当年参加吏部“大挑”时的情形,颇为有趣。所谓“大挑”,是

吏部为久试不第的举人所筹的一条出路,钦派王公主持面试,一等派地方官,二等派教职。地方官重威仪,面相成了主要条件,以“甲”字脸、“国”字脸最为吃香,上宽下尖的“甲”字脸,宽额脸上的“由”字脸,以及上下皆锐的“申”字脸都比较吃香。话说咱们这位阎先生,身不满五尺,二目一高一低,刚进考场,便有某亲王府声嘶力竭:“阎敬铭,出去!”可见“大挑”对相貌要求之苛。只是这样一来,不免“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断了不知多少“我很丑,可是我很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前程。

大江歌罢掉头东。新社会新气象,按说不该再以貌取人了,但就有抱着“国粹”不肯撒手的。多年前湖北省一孟姓副省长,高干高色交易,贪污受贿。东窗事发,中纪委调查组让他交代问题,他百般抵赖,最后干脆把麻衣相搬了出来:“好人坏人看面相也能看出来。就凭我这面相,你们看我像坏人吗?”可惜人家纪委办案重事实看证据,不管你是“国”字脸还是别的什么脸,这位原省长大人的“辨奸”,传出来只好当老百姓茶余饭后的笑料了。